

一封没有发出的家书

□ 戚善成



母亲、哥哥：

我在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从延安到东北来，同年十二月彩琴带淮北来东北。在东北两年多了，我们身体都好。彩琴又生一女儿，名字叫东北，很像淮北，快能走了，满健康。彩琴原先身体不好，生东北后保养得好，现在很壮很胖，请勿念。我在延安就做炮兵工作了，因我在苏联学习的炮兵，我很喜欢这工作。到东北后，人民炮兵大大发展，我很高兴地做着，身体比过去更好了，工作精力更大，工作也还顺利。

东北发展很快，我想不久我们就要打进关，与华北会合，胜利（这次是真正的胜利了）与家乡见面，希望母亲、哥哥、嫂子及小侄等健康，均团圆见面才好！

苏北及山东打仗很多，听说家乡年成很坏，不知家中如何？

母亲健康否？哥嫂健康否？如有可能，请写个信来，因山东、苏北、东北已可通邮，写信是可以寄到的，只是慢点，不要紧。

苏北及山东跑反，士杰及坤一、小玲都跑到东北了，后找到我们，现分配在哈尔滨工作（公安局工作），他们都好，在东北坤一又生了儿子，名字叫七七（因七七生），一切都很好。还有其他朱家妹妹跑到东北，我等未找到他们，后来又都回山东及苏北了，我只接到陈爱华一封信，她写信告诉我她回山东去了，我同她也未见过面。

听坤一说，大卓在跑反中失踪（走失），现找到没有？

母亲是否仍在二姐家住？二姐家境情况如何，各亲友情况如何？均请赐知。

因为记挂母亲及哥嫂，去年六月曾派人到山东送信并附相片给家里，因山东打仗，都没送到，至今家中情况不了解，常觉不安，特别母亲年近，是否健在，时刻不忘，务请哥哥据实详告，如仍健在，请多予侍奉，以期胜利后还能团圆，至盼！

各子侄辈，仍希统统推动他们出来参加革命工作或学习，才不致

落到时代后边，甚至做对人民不利的事情。此事情请哥哥多负责领导他们。

祝阖家平安！
敦仲敬上
九月八日
（书信为节选）

这是一封没有发出的家书。写信人是曾任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的朱瑞，收信人则是他远在江苏宿迁老家的亲人。

早年离家，为了革命始终未归

朱瑞，又名朱敦仲，1905年生，江苏宿迁县宋大兴庄（今江苏宿迁市宿城区龙河镇）人。1925年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春回国，1932年1月到中央苏区，参加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夏，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10月参加长征。历任中央特派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红军总司令部科长、红军学校教员、红三军政治委员等职。1946年10月起任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

1948年7月，朱瑞从前线回到哈尔滨，参加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讨论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计划和准备工作，组织决定让他留在后方，但他坚持要求上前线指挥作战。1948年9月8日，在即将奔赴辽沈战役前线之时，朱瑞给母亲和哥哥写了一封信，倾注了他对亲人的无尽思念、对革命即将胜利的喜悦和对炮兵事业的一腔热忱。

1948年9月9日，朱瑞看望了到哈尔滨出席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山东枣庄煤矿一位姓张的工人代表，并托他将信捎给在家乡的母亲和哥哥。9月10日，朱瑞告别妻女，从哈尔滨急赴辽宁锦州前线，10月1日牺牲于义县战场。噩耗传到哈尔滨时，这位张代表尚未返回山东，遂将信件送还给朱瑞的妻子潘彩琴。此后，这封信一直珍藏在潘彩琴身边。直到1994年潘彩琴离世，朱瑞的这封家书和其他遗物由其亲属捐赠给哈尔滨烈士纪念馆。

朱瑞自1925年留苏，直到1948年战死沙场，其间一直没有回过家乡。

1930年1月，朱瑞从苏联回国，抵达上海后，在东亚酒楼住下，等待党组织派人前来接头，然而望眼欲穿，却始终无人登门。当时的上海，天气阴冷，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国民党反动派叫嚣着“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到处抓捕

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朱瑞先发报到德国柏林共产国际分部，但杳无音讯。朱瑞又到徐州向一位老同学探听消息，发现其吞吞吐吐，神色慌张。为防止意外，朱瑞当即乘火车连夜赶回上海。徐州离宿迁很近，朱瑞原想顺路回家看看阔别多年的母亲，但为了革命他压抑住心中的乡愁，继续一心一意寻找党组织。3月，他在街上碰到了在苏联时见过的邓颖超。在邓颖超的帮助下，中央组织部派人把朱瑞接到了隐蔽的中央军委机关，并由苏联共产党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朱瑞回忆说，从莫斯科动身，到找到党，先后6个月，这中间是我最孤零苦闷的时候。在找到党以前，我就像失去母亲的孤儿。

1935年10月，朱瑞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0月的黄土高原，天气已经很冷了，战士们没有御寒的棉衣，没有果腹的食物。朱瑞辗转寄出一封写给哥哥朱珮的家信，备述困苦，盼哥哥接济。朱瑞的老母亲已经10多年没见到小儿子了，知道小儿子来信了，竟然放声大哭起来。听说小儿子在外有难，敦促大儿子快去看看。朱珮凑足了40块大洋，于1937年春天送到西安。通过杨虎城将军的秘书，中共党员、苏北同乡宋绮云引见，朱珮和朱瑞兄弟俩异地重逢。两人从白天一直聊到夜晚，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朱瑞把哥哥送来的钱一部分交了党费，一部分给困苦同志。朱珮要回宿迁了，朱瑞送了一程又一程。望着哥哥的身影渐行渐远，朱瑞突然向哥哥跑去：“哥，你等等。”朱珮回过身来，兄弟俩拥抱在一起。朱瑞说：“哥，看形势，中日必有一战，战端一开，共产党责无旁贷。我不大可能回家了。家里的老母亲，还有大大小小的事都在你肩上了。我这里先给你磕个头，你带给娘……”

1943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在山东抗日根据地迎来了与妻子潘彩琴结婚一周年纪念，阔别18年的老母亲在大哥朱珮、侄女朱华的陪伴下，也冒险从老家宿迁一路颠簸赶到沂蒙山区相聚。此时此刻，朱瑞的心情既激动又复杂，因为他刚接到党中央指示，要他急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朱瑞不得不割舍他和母亲、哥哥等亲人的这一次阖家团圆，动身奔赴延安。

在朱瑞心里，祖国母亲永远大于天。

纸短情长，红色家书永不褪色

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朱瑞对家人充满感情，他记挂着家人的健

康，更殷切盼望着革命胜利后和家人团圆。此外，他鼓励小辈们参加革命工作或学习，叮嘱家人能够和他一样参加革命，“才不致落到时代后边，甚至做对人民不利的事情”。

然而，朱瑞的这封信最终并没有传到母亲和哥哥手中。1948年10月1日，辽宁义县县城在朱瑞率领的炮兵部队200多门火炮的强攻下，守敌1万余人被歼，义县顺利解放。当天下午，朱瑞在战场尚未打扫的情况下，深入战场一线探查，不幸误触敌人埋的地雷，壮烈牺牲。10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唁电：“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后中央军委决定将东北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兵学校。

为了抗日救国、为了解放事业，朱瑞一家失去了好几位亲人。他的结发妻子陈若克，上海人，曾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妇委会委员，1941年冬天在日军对沂水、沂南进行的“大扫荡”中不幸被俘。在狱中，陈若克坚贞不屈，惨无人道的日军用刺刀刺死了她和她出生仅20天的孩子。朱瑞的侄女朱华也在鲁南反“扫荡”中牺牲，至今未找到尸骨。在朱瑞的感召下，他的家乡宋大兴庄先后有20多位有为青年加入革命队伍。

朱瑞在这封家书中提到：“我只收到陈爱华一封信，她写信告诉我她回山东去了，我同她也未见过面。”陈爱华是朱瑞的外甥女，1937年遭从二舅朱瑞的教导，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2001年6月，她从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本《革命烈士遗文大典》中看到了朱瑞的这封信，顿时泪流不止。“二舅写的这封信我没有见到过，没想到事隔50多年后才知道他当时已收到我给他的信。二舅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军事将领，他的牺牲很可惜，后人要想着他，纪念他。”

1948年9月28日，中秋节。朱瑞在辽沈战役前线行军到辽源宿营。夜深人静时，他提笔给妻子潘彩琴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说：“此次去前方，中秋日同志一起欢度倒也愉快，特告请勿以我为念。”潘彩琴没想到，3天后，朱瑞牺牲。从那之后，她把对朱瑞的思念珍藏在心底，替朱瑞照顾年迈的母亲和家人。1962年春，朱瑞母亲过世时，潘彩琴节衣缩食挤出钱款将其安葬。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朱瑞的红色家书如今虽已陈旧、泛黄，但是纸短情长，字见风范，看似和家人谈家常，却启人向上、催人奋进。

（摘自2019年10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1884年5月出生於湖南宁乡。1905年考中晚清秀才，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时期和失败后的一段时期里，谢觉哉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先后任《大江报》《红旗报》《工农日报》主编。

1933年4月，谢觉哉到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等职，主持和参加起草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令和条例。

1934年10月，谢觉哉参加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兼秘书长，后又任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七七”事变后，谢觉哉赴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同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高等法院院长。1939年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1948年8月，谢觉哉担任华北人民政府委员，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1959年4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965年担任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71年6月15日在北京逝世。

谢觉哉一生，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数十年如一日，做人民的公仆。他规定子女不能随便用他的车子，也常对他们说：“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在内务部，谢觉哉本着“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精神，参与制定救灾救济抚恤政策，赴各地灾区访贫问苦，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地雷战王”王耀南

□ 吴昌荣

早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王耀南就提出用竹筒等器材做地雷迟滞敌人进攻的设想，创造并完善了从造雷、埋雷、引雷起爆，到反探测雷、反挖雷、保护自己布设雷场等一系列工作。王耀南还提出用电打火的办法，将起爆装置和地雷分开一段距离，使地雷只炸日军，不炸误入雷区的老百姓。他还通过军区发出训令：只有当确实看到日军的行动方向才能安装地雷的击发装置。这是地雷战战术非常重要的一条，即家喻户晓的“不见鬼子不挂弦”，解决了误炸自己的问题。

1941年2月，彭德怀命令王耀南指挥构筑黄崖洞兵工厂防御工程，并且批准王耀南可以大规模使用地雷和构筑大量永备工事的方案，组织工厂研制和大量生产地雷、滚雷等土装备。于是王耀南提出了“在厂区布地雷阵

司法先驱人民公仆

□ 刘良恒

谢觉哉不仅亲自办案、典型示范，还深入全国各地法院，查看案卷，纠正冤假错案，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

“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这是延安时期人们赠送谢觉哉的诗句，也是谢觉哉革命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摘自2019年9月19日《人民日报》）



打击进入兵工厂敌军”的方案。此时，王耀南认为地雷战术基本成型。他经常带着八路军在总部驻地农家小院里演习如何布雷打击日寇。王耀南完善了演习方案以后，彭德怀指示他开始推广地雷战，牵制日军对根据地的进攻。于是王耀南开始带领工兵干部通过演话剧的方式推广地雷战。王耀南为了节省制雷成本，提出了凿石头做雷壳，造最便宜地雷的方案。

1941年冬天，聂荣臻向朱德请调王耀南到晋察冀边区推广地雷战。王耀南奉命前往。他到达后立刻投入工作，先给司令员和领导说明了日军探雷器的工作原理和性能，提出把地雷的起爆装置和老鼠夹子相连接，用马尾当绊索等办法反日军排雷。在王耀南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地雷制造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对前来“扫荡”的敌人起到了巨大的震慑作用。

（摘自2019年11月28日《人民政协报》）

我的父亲吕正操，从革命战争的枪林弹雨中走来，在冀中平原抗战中建立了卓越功勋，是开国上将之一。2009年10月13日，父亲以105岁高龄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和共产党员的风范，一直影响着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父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著，读懂了它，也就读懂了人生。父亲对我影响至深，他的点滴言行造就了今天的我，我将永远怀念他。

人民永远是靠山

人民永远是靠山！父亲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让我体会颇深，因为我的生命就是靠人民群众保护下来的。

我出生在1942年“五一”大扫荡之后，电影《吕正操1942》的结尾处，战士们高声欢呼着“我们有儿子了”，那个“儿子”正是我。

我永远感恩那些保护我出生、成长的八路军战士们。母亲曾向我介绍过背着年幼的我艰难行军的高辉叔叔，虽然那时我还很小，但高辉这个名字依旧深深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感恩人民，这是父母教会我的。1933年，父亲参加了热河抗战，193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父亲和黄敬、程子华在冀中组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他们和八百万冀中人民筑成了携手抗战的血肉长城，创造了平原抗战的人间奇迹。

父亲在冀中发展统一战线，群众

父亲吕正操教我的人生道理

□ 吕彤羽

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抗战部队由几千人迅速扩大到十万人，还动员了几百万百姓送粮送物到前线。直至1942年“五一”大扫荡、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前，冀中八百万人民紧紧团结在由三人组成的领导班子周围，把冀中抗日根据地变成了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第三纵队成立3周年之际，毛泽东从延安发来亲笔题词：“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模式，坚持人民武装斗争的模式。”

当多大官不要紧

我虽然没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作用，但在父亲的教导下，明白了踏踏实实、本本分分干工作的道理。父亲尊重儿女们的选择，只要求我们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并反复强调他不会做任何人的保护伞。

我出生在抗战时期，长在抗战环境下，从小就对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时候，还因把手榴弹的壳揭下来玩耍差点酿成危险而被父亲狠狠打了一顿。长大后，我选择了上军校。毕业时，父亲把我送到当时条件最艰

苦的空空导弹部队锻炼，除了养猪、放鹅、站岗，我把其他所有能利用的时间全部用来学习空空导弹知识。

1966年，我进入航天部二院工作，一干就是一辈子。

“文革”期间，我被下放到南京炮兵部队，在那里，我和同事们研制出炮兵测地计算机，这是国内最早的专用便携式数字计算机，还被送到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展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带领团队研制出新的制导雷达数字电子计算机系统，完全替代了之前的电子管模拟计算机，这个项目的出口创汇产生了巨大的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

人生总有面临抉择的时候，当我对事业感到迷茫时，又是父亲的一句点拨令我醍醐灌顶。那时，我正在带领大家进行一项新设备的研制，一天，院领导找到担任副所长的我，询问我是否愿意调到其他单位当一把手。犹豫之际，我找到父亲，跟他商量是去是留。父亲听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当多大官不要紧，重要的是给人民办多少事儿！”一句话如拨云见日，我当下就决定婉拒组织上的推荐，继续静下心来完成手头的科研任

务。这项研究课题，后来获得了200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我们3位并肩作战的同事也成为国家级劳模。通过这次重大人生选择，我深刻体会到：给国家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比一些有名有利的东西更让人感到心里踏实。

人生难得老来忙

父亲的一生，与抗战紧密相连，他一直希望后人能多了解抗战历史的本来面貌和真实场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世的抗战亲历者越来越少。如何让后人记住这段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成了父亲心头挥之不去的牵挂。他说：“我常常想起那些为了保护我们而惨死在日本侵略者刺刀下的乡亲们和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们。”正是靠着这种情怀，他于1983年创办了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料研究会，并担任首任会长。他想趁大部分将领和士兵都在世时，请他们把亲身经历的战争场面写下来。研究会成立不到十年，就收集整理装订出50册抗战史料。

事实证明，父亲是颇有先见之明

的。目前所有根据地中，冀中根据地的历史档案和战斗记载最为翔实。2008年我退休后，接任了研究会会长一职，曾沿父亲当年的足迹，走访了多处原冀中抗日战场。

我现在能做的事情，主要是整理这50册珍贵史料，让更多人穿越时空走近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了解在冀中大地上曾经发生的军民一家共御外敌的感人故事。

为了方便查询保存，我已经把这50册资料全部电子化。当年的老照片、抗战史料在手机上就能查看。

体育运动是关系中华民族精神状态的大事

除了努力工作、回报社会以外，我还很注重体育运动，尽力保持身体健康。重视强身健体也是父亲对我的重要影响之一。

父亲说他一辈子做了三件事：打日本、修铁路和打网球。

不少人说，打网球和前两件事相比太微不足道，父亲却不以为然，说：“体育是关系中华民族精神状态和总体素质的大事，不是小事！”

